

传家宝

沙元炳与郭仲达
撰刻铭文思亲人

□彭伟

古人不及今人幸运,有个人档案可寻,仅有部分富庶人家、书香门第,亲朋会为逝者撰写铭文,这往往成为了解逝者生平为数不多的第一手史料,具有相应的文献价值。传承地方历史、弘扬地方文化,铭文铭石的作用,不可小觑。近年来,笔者屡屡有幸拜观有关如皋乡人的铭石。其中一块为如皋晚清翰林、实业家、教育家、诗文家、藏书家沙元炳(1864—1927)既撰又书的铭石——《子妇何詠蕙墓志铭》。

沙宝臣、沙元炳父子,逝后均下葬林梓河东戴港。多年前,沙元炳墓地遭到破坏,最后仅余两石,其中一石正是《子妇何詠蕙墓志铭》。此石丢在附近一所庙前。那年夏天,有人来到如皋,寻到博物馆,希望捐献此铭。博物馆人员请他携石再来。此石不小,长45厘米、宽44厘米,又很沉重,运输不便。来人不愿费钱费力运送铭石,便廉价售予私人玩家。约在2022年,友人思晨获悉《子妇何詠蕙墓志铭》的下落。由此,我有不虞之喜——获赠《子妇何詠蕙墓志铭》拓片。

何詠蕙(1885—1916),清赠安徽候补通判何若霖小女,21岁嫁给沙元炳长子沙进为妻,贤惠淑德,于沙家家政贡献良多。她还是上海市政府原副市长沙麟的祖母。她离世后,沙翁于悲痛中撰写此文,后人整理,录入《志颐堂诗文集》。两种文本,稍有差异。《子妇何詠蕙墓志铭》刻有著者署名:清赐进士出身翰林院编修沙元炳撰并书。铭石上的铭文为沙元炳手泽——其字小楷,颇为端庄清雅。此外,正文又有一字之别。沙翁吟咏:“余虽未甚老,病与衰臻,吾又安知能终抚吾孙,及见其成立如吾儿时邪?”《志颐堂诗文集》版本作:“病与衰并。”谋字富有想象力,仿佛病魔与人衰不谋而合;日后改为衰并字,较为客观。不过此句,尽显沙翁的担忧,儿媳已去,自己已老,孙辈由谁抚育成人呢?螽斯蛰蛰,瓜瓞绵绵,素为古人视作延续家族的关键。不幸的是,沙元炳另撰《沙迎妻顾合璧志铭》,他的仲子沙迎离世时,年仅十七岁。沙翁暮年,久郁成疾,过早下世。坊间传闻,源自编纂县志,沙翁积劳成疾,以至病逝。此说过于片面。从铭石及《志颐堂诗文集》诸文所述,家谱未能续修,以及痛失亲人——白发人送别黑发人,也是沙翁忧郁成病的原因之一。

像沙翁一样,如皋文人郭仲达(1887—1945)也为痛失晚辈亲人撰文。数年前,如城改造,我有缘购入一方铭石《承庆葬铭》。此石长37厘米,宽35.5厘米。四端刻有波浪形花纹,颇为优美。刻者倪景山时有名气,不仅善刻墓石,而且精雕梨枣。此铭精短精美,连题录下:

亡妻郭氏,承庆其名,雍南众子,寿和所生。生岁逢午,殇年值酉。春腊凡三,夏秋四有。始生之日,意亦弗加。及其既殇,靡思匪遐。兰摧槿寿,矧在余爱,以铭以藏,千龄勿败。

如皋倪景山刻石

据此铭文,郭承庆为郭仲达(郭雍南)孙子。他生于庚午年(1930),卒于癸酉年(1933),年仅三岁夭折离世。“千龄勿败”,只是郭仲达的美好愿景。书商售石于我时,铭石中间已经裂出一条长线,殊为可惜。不过铭石的存世,除去亲情可赞,还有友情可言。徐邃,字贯衡,号澹庐,南通籍诗人。他是郭仲达的好友。徐邃喜好收藏古币,常请友人同赏。郭老作有《题澹庐品泉图》:

轻重关兴替,一钱殊可观。品希如赵璧,文古诋殷盘。屋角花犹少,窗心月共刊。何当同韶览,把玩拾前欢。

有感两人情深,铭石文书俱佳,我囑托寓居通城的西冷社员李夏荣道兄拓印此铭(见下图),并题跋:《承庆葬铭》,名士郭仲达哀其孙殇作。甲辰四月于雒水,草虫之居主人应彭伟之倩,夏荣题端。经此题写,书印俱美,通知两地的文人情谊,又得到了延续。



通城黄包车的兴起和淘汰

□程太和

黄包车,又称人力车、东洋车,早在民国初年就在南通社会上出现了。黄包车结构比木制独轮车轻便,且主要部件由铁制成,其牢固性、稳定性、行走速度等,都优于独轮车。

黄包车传入南通后,数量迅速增加。黄包车分营业用和自备两种。能够上街营业的,必须先领到南通县政府发给的黄包车(人力车)照,是一种搪瓷的车牌照,钉在车子上。当时南通老城区内,乘坐一次车费约铜圆15枚至20枚。起初时,黄包车的轮子是“铁箍轮盘”,遇到道路不平比较颠簸。后来,由南京、苏州、上海等引进了钢圈、钢丝辐条和充气轮胎,乘坐比较舒适了。到1919年,南通有黄包车行9家,黄包车600多辆,另外还有几十辆家庭自备车。

黄包车车夫收入微薄,收入靠运气,叫车的人多,收入就多一些。遇到善心的雇主,多给几个钱;碰上地痞流氓,坐车不但不给钱,还要寻衅滋事。一般顾客叫车,先论车价,两相情愿,再坐车拉车。风霜雨雪,只要有人雇车,也顾不上辛苦与否。黄包车乘客多为旅客、病家或有急事赶路者,另一些有钱有身份的人上影院看戏、去酒家赴宴,或是走亲访友,也坐黄包车。结婚讲排场者,在花轿前舆淘汰后,新郎新娘和宾客也坐黄包车送亲迎亲。黄包车属于非机动车,但有时车夫跑得过快,也会发生撞人、撞物、翻车伤人、撕破行人衣物等事故,免不了纠纷一场。

至解放前夕,南通城有黄包车2800多辆。南通城解放后,1949年4月10日在南通市总工会领导下,南通市人力车(黄包车)工会成立,工会办公地点在东南营仓巷节孝祠。1950年,人力车工会下设9个分会,后增至11个分会,有会员2144人,其中城区会员1417人;全市有人力车2860辆,是市区重要的交通工具。由于南通城刚解放,社会经济处于恢复阶段,面对人力车过剩、工人生活困难等问题,政府在8月份动员两批人力车工人回乡务农,共110人。后又于1952年动员600多人回乡务农。至1958年10月,南通的人力车(黄包车)就不再见于市面了。



张謇以月入联

□夏俊山

月到中秋分外明,中秋佳节,一轮明月高悬天空,光泻万里,激发了多少文人墨客的灵感,他们不仅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咏月诗,还写了不少以明月入联的佳作。例如南通先贤张謇留下的一千多副对联中,就有不少与月亮有关的佳作,其中,有一些还留下了墨宝,且举数例。

“举手可邀月,飞花正丽春。”此联款识为:“万臣先生雅正,啬翁张謇撰。”“撰”表明:张謇不是抄录、不是集句,而是原创。李白《登太白峰》:“西上太白峰,夕阳穷登攀。太白与我语,为我开天关……举手可近月,前行若无山。”诗人以“举手可近月”,极写出太白峰的高峻。李白还有诗句:“俱怀逸兴壮思飞,欲上青天揽明月。”(《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》)。登上谢朓楼,诗人神思飞越,想乘风归去、揽月入怀,其飞动健举的形象,体现了豪迈的意气。张謇“举手可邀月”同样有一股豪迈之气。下联“飞花正丽春”,“丽”宜作使动理解。飞花使春天更美丽,赞赏花,透露的是自信。张謇

撰写此联时未必在赏月,但是,如此豪迈自信,应该是在人生的高光时刻。

“持杯属江月,散发据胡床。”款识只有姓名与印章,写于何时,已难考证。上联“持杯属江月”,属,通“属”,与前一联相同,讲的也如“举杯邀明月”。下联“散发据胡床”,“散发”与“束发”相对,头发自由散开,表示自由自在的舒服状态。孟浩然(689—740)的《夏日南亭怀辛大》:“山光忽西落,池月渐东来。散发乘夕凉,开轩卧闲敞。”李白有诗曰“抽刀断水水更流,举杯消愁愁更愁。人生在世不称意,明朝散发弄扁舟。”胡床自外国来,东汉时名“胡床”,隋改名“交床”,唐称宗时又名“绳床”。其形制为:床足斜向交叉,上施床面,称之“交床”,有人认为大致类似带靠背的大马扎。此联不是张謇原创,而是出自宋代陆游的《追凉小酌》:“绿树暗含梁,临流追晚凉。持杯属江月,散发据胡床。苦荚腌羞美,莼蒲渍蜜香。醉来呼稚子,扶我上南塘。”张謇书此联,不排除这是赏月饮酒时,兴之所至留下的。

“明月常圆无晦朔,此泉何处觅寒温。”款识:豹君贤弟,张謇。上联出自苏轼《再游径山》,诗中有句云:“白云何事自来往,明月长圆无晦朔。家上鸡鸣犹忆炊,山前凤舞远微埃。”

“晦朔”指的是农历月初(朔)和月末(晦),月亮不受时间变化影响,保持圆满的状态,以月亮的恒常之美,表达对不变之美的追求。张謇将“长圆”写成“常圆”,“长”偏重时间,“常”偏重频率。张謇与“豹君贤弟”不可能长厮守,但可以常相聚,一字之改,既表达了情谊不变,又切合实际情况。下联出自苏轼《余过温泉壁上有诗云直待众生无垢我方清冷》:“石龙有口口无根,自在流泉谁吐吞。若信众生本无垢,此泉何处觅寒温。”温泉从石龙口中流出,一吞一吐,并不受任何人控制,是自然流淌。禅宗的观念“众生本无垢”如果是对的,那么泉水的寒温对人又有什么影响呢?下联展现了苏轼敏锐的思辨能力。泉水不受“控制”,“寒温”不影响人,那么,我们的情谊也

应该不受时间、环境等因素的影响——这副集句联是否有此含义?

“瘦影在窗梅得月,凉云满地竹笼烟。”款识为“季直张謇”和两方印章。此联系诗词摘句,摘自宋代米芾的《无题》。张謇写给何人、写于何时,信息均缺失。不过,这并不影响我们欣赏此联。“瘦影在窗梅得月”,描绘了一幅月光下梅花孤傲独立的画面,梅花的瘦影映照在窗户外,仿佛是月光与自然的交响乐章,展现出一种高洁与孤独并存的意境。“凉云满地竹笼烟”,则进一步渲染了环境的清凉与幽静,凉爽的云雾弥漫在大地之上,竹林间似乎笼罩着一层轻烟,营造出一种超脱尘世的气氛。作者以梅、月、云、竹等自然元素为载体,传达出一种超然物外的情怀和对自然之美的深刻感悟,其中,梅的出现,表明此联中的“月”不是中秋月,而是冬日夜晚的月。

“招呼风月资谈柄,结束云山入画栏”——这是张謇留给后人的一副集句联。上联是清人张凤孙的诗句,下联是清人张穆的诗句。

中秋佳节,赏月月佳联,观状元墨宝,人生一大乐事也!

话说通州历代地方志

□冒建国

据文献记载,南通最早的方志始于北宋太平兴国年间,其后历代均有修纂,绵延不绝,颇具规模。历代修志,一般由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担任主修,亲预其事,并延聘各方才学渊博、熟知邑情的名人贤士通力协作,共同完成。

南宋宋代方志基本已亡佚。阮琳纂《通州(旧图经)》、杨阜纂《通州图经》仅有残章断篇散见于南宋王象之著《舆地纪胜》。书中卷四十一引“《淮南东路·通州·古迹·三虎化船》”;同卷《淮南东路·通州·风俗形胜》文中注“崇宁中郡守杨阜作《通州图经》序”。《舆地纪胜》转记通州(旧图经)《通州图经》的内容,涉及形胜、风俗、建置、沿革、疆域等,其中形胜类于今之概述,风俗类于今之说法。

孙昭先纂《淮南通州志》十卷,又名《淮南通川志》,为南通第一部州志,版本失传。孙昭先,南宋龙溪人,淳熙进士,开禧三年知通州,此志即纂于任上。《舆地纪胜》《宋史·艺文志》《永乐大典》、万历《扬州府志》等均引用了此志,内容涉及建置、沿革、疆域、仓储、人物、城池、市镇、官署等,资料翔实,记述鲜明。

明代,南通七修州志,五佚二存。永乐《通州志》一卷,永乐十六年严敦大修。景泰《通州志》一卷,景泰五年孙徽修。弘治《通州志》二卷,弘治四年施纪修。以上三志均亡佚。

嘉靖《通州志》由直隶扬州府通州知州钟汪修。钟氏,南海人,进士出身,奉训大夫。嘉靖七年,钟汪赴任伊始,首询图志之事:“以观风土之宜,察民物之故,征治化之实。”言及方志,钟汪曰:“夫志何者也?夫志备物轨昭典刑,以辅于有政者也……是故,于地理知所以体悉焉,于职官知所以法戒焉,于人物知所以表章焉,于辞翰知所以考照古今焉。循之以

施于政也。”然而,“通州旧志,世远无传”,唯有弘治四年所修州志尚存,却是“讹缺殊甚”。钟汪慨叹不已,特聘福建莆田举人林颖、通州学正陈待科、训导张坤、卞玉庐、金润、生员丁铁等,以原通州举人顾贻“具稿而未成篇”的实录为基础,“旁搜芟补,采辑稽考而成”。钟汪为书作序付梓。嘉靖九年刻印成册。

嘉靖《通州志》四卷,嘉靖三十三年黄国用、吴桂芳修,丁铁纂。由丁铁自序。此志亡佚。

嘉靖《通州志》八卷,嘉靖三十八年喻南岳、李汝杜修,钱峰、江一山纂。有李汝杜《序》、马坤《序》,此志亡佚。

万历《通州志》由通州知州林文程主修而成,林氏,字登卿,福建晋江人,进士。以刑部郎出任通州“凡三载,政修人和”,其间,稽查古时图籍,见“州志久不修,文献莫征”,遂于万历五年初,聘浙江鄞县人沈明臣、州人陈大科、顾养谦等,同心协力,力主成卷,“仅及岁而志成”。刑部尚书王世贞为其撰序。

清代,南通所纂州志六存一佚。

康熙通州志编修只有三年却历经坎坷。康熙九年知州王宜享到任,王氏,字伯贞,陕西华阴人,进士。王氏深知修志辅政的重要,曾数番考州志。时逢廷“上喻纂修通志”,王氏“奉命不敢后”,即聘清通州庠生范国禄从事其事。康熙十一年,康熙《通州志》二十四卷终成,范国禄“镂板呈样本”,“为有力者所构(毁)”,范自削其名,投书而去,王志卒”。王宜享“不敢以一邑之缺略,少致罔上之愆”,急聘钦赐进士王儆通、举人王兆陞、孙魁宗、李遴等共襄其业,于康熙十

三年修成。

乾隆《直隶通州志》由江苏直隶通州知州王继祖修,与康熙《通州志》相距八十年。乾隆十八年四月,王继祖聘翰林院检讨夏之蓉、通州贡生丁有煜、廪生王原、陈瑞,泰兴县廪生戚貽壮,如皋县廪生范景颐,监生冒春荣等二十多人在书院设馆开局。王继祖“数过馆中,与同纂诸子商榷。去取厘,正误缺,不以私废公,不以疑饰信,务使据实笔削,言不过则”。乾隆十九年四月志成,王继祖作序。乾隆二十年刊毕印行。

道光《江南直隶通州志》十七卷,顾鸿修,李珙、杨廷撰纂,道光年间仅刻成七卷,原稿本已残,仅存一卷。

咸丰《直隶通州志续编》,冯云鹑纂,记事至咸丰四年,已残,存人物、选举、艺文三篇。另有《州志辑要》,王沙氏辑,稿本。

光绪《通州直隶州志》,同治四年和十年先后任通州直隶州知州梁悦馨、同治十三年任通州直隶州知州莫祥芝修。梁、莫二氏深感“欲有以昭法戒,备兴观,究利弊,窃以为当先于志书求之。乃郡邑志书,往往因循失修或迟至数百年之久,往迹就湮,采辑愈难,不知者忽焉,知之者畏焉,文献无征,遂使古之时可为借鉴之事,后人皆茫然焉,岂不惜哉!”于是对道光《通州志》“详加搜讨”,即于同治七年“设官局,聘名士”,特邀四品卿翰林院编修季念诒等四十九人,共谋州志。梁、莫二氏“时过馆中,与诸君商订大略”,并与同纂诸君以百余年来记载,加以网罗采访,订正旧志。取旧志所载,删其繁、正其讹、补其缺。经过八年寒暑,于光绪元年完成了这一鸿篇

掘港上真观龙牌入藏如东博物馆

□班山人



掘港上真观,老百姓称为“上真庙”,建于明代,原址位于北街北侧,山门正对竖街,有山门、真武殿、玉皇宫三进,东侧都有天庙连为一体,统称“上真观”,规模较大。西侧即两淮盐运通州分司掘港盐署衙门和如皋县掘港场主簿衙门,地处繁华,热闹异常,香火鼎盛。

史载掘港上真观有一块龙牌,上书“当今皇帝万万岁”,每年正月初一盐场大使、主簿、都司掘港文武三堂官都要到上真观朝拜龙牌,此外每月初一、十五,地方官要到上真观讲圣谕广训,因此这里民间称为“皇宫”。

为何祭祀真武大帝的道观会供奉龙牌呢?《两淮盐法志(乾隆版)·掘港场图》

中标注该庙为“佑圣观”,从当时庙宇的名字也可以看出,早期至少到清代的乾隆朝,上真观还叫佑圣观,应该是供奉当时皇帝牌位,起到生祠的作用。掘港临海,真武帝主水,应为后来主供奉真武帝,龙牌又不好撤去,一直保留着。这块龙牌只见于史书记载,现在见过的人不多,经历文革“破四旧”,这块龙牌估计早就不存在了。

笔者大姑丈的父亲曾是上真观道士,我曾听姑丈说上真观“道经师宝”铜印和龙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其父亲保存,龙牌其实有两块,一块写“当今皇帝万万岁”,另一块写“当今万万岁”。姑丈父亲20世纪60年代

羽化后,铜印和龙牌归其二子保管,改革开放后其师弟将铜印和龙牌索要去,后来就不知道踪迹。近日笔者在一户头发现一块写有“当今万万岁”的牌位,不由联想起上真观龙牌,经联系,确认是小时候家中保存的上真观龙牌。龙牌为松木质,高27.5厘米,宽13厘米,厚9厘米,整体有云头、牌身和底座三部分,可以拆卸,周身披麻挂灰,髹红漆刷金,正面书楷书“当今万万岁”,历经岁月已经斑驳(见左图)。专家认定为明代物件,目前已入藏如东博物馆。

实物是历史的最好证明,可惜能存者百无一二,上真观龙牌恰印证了晚明如皋东乡之掘港场那段历史,弥补了历史的空白,历史宗教文献价值较大。